

涵芬樓和東方圖書館

汪家燾

(商務印書館)

就近现代图书馆事业史讲, 东方图书馆是应该提一笔的。它从1926年公开开放到1932年毁于兵燹, 虽只有短短几年时间直接和读者接触, 但单就这一点整理一个材料、供研究图书馆事业史的同志研究参改, 仍有一定价值。

东方图书馆是商务印书馆向社会开放的图书馆, 有四十多万册藏书。它的前身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图书资料室——涵芬楼。出版机构有这样规模的图书馆, 自来都极少有, 这和商务印书馆早期一批核心人物, 特别

是张元济有关。蔡元培、张元济(1979年版《辞海》均有条目)早年有志于救国, 并认为应从培育人材着手。戊戌政变, 他们离开北京, 先后来到上海。1901年张元济加入商务印书馆, 次年组织编译所, 请蔡元培担任商务印书馆的第一任编译所负责人。不久, 张百熙奏进学堂章程, 蔡元培等就规划和着手研究、编写小学课本。1903年夏天, 蔡元培因为鼓吹革命, 清朝政府要抓人, 他离开上海到青岛。张元济就自己担任编译所长, 爱国学社蒋维乔, 后来, 高梦旦、杜亚泉等也参

为了使馆藏便于读者利用, 有力地促进教学和科学研究水平的提高, 并直接为培养学生服务。我们一方面为教师、研究生、高年级大学生专门开辟了教师科技图书阅览室(以陈列外文原版专著、会议录为主), 外文科技过刊、特刊资料文摘索引阅览室及外文现期期刊资料阅览室。上述阅览室开架借阅, 陈列有较完备的各种工具书, 配备有咨询人员。另一方面, 我们努力办好直接为学生服务的阅览室和借书处。如学生科技图书参考阅览室, 和教研组配合, 每学期请任课老师提出参考书目, 不断充实更换陈列图书, 公布参考书目单, 对学生开架借阅。为加强学生外语学习, 增设了开架外语阅览室。为适应理工科学生也要学点文科的要求, 我们还努力办好社科、文艺书刊阅览室。所有这些, 都深受学生的支持和欢迎。

为了加强图书资料的交流传递和资源共享, 我馆与国际上四十多个国家或地区的二百多个大学和研究机构建立了书刊交换联系; 在国内, 除了与近两千个单位建立书刊交换关系外, 还设立了馆际互借

处, 办理与北京市兄弟馆间的书刊互借手续。

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 在加强科学管理, 提高服务质量的同时, 正根据可能, 大力推进图书馆现代化的工作。近几年来, 我馆添置了静电复印机、显微阅读机和视听设备。1978年从培训人员开始, 建设了小型计算机室。目前正开展应用计算机进行图书资料管理和检索的研究试验工作。这方面的工作曾在全国图书馆学会1980年年会的科学讨论会上作了报告。

在建馆七十周年之际, 回顾过去, 展望未来, 感到任重道远, 前程似锦。一方面差距很大, 无论在建筑、馆藏、科学管理、服务质量等方面都还远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要求; 另一方面, 有党和国家的重视, 有长期的文化科学资源的积累, 有全馆工作人员的努力奋斗和全校同志的支持, 清华大学图书馆必将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综合性理工科大学图书馆。

(清华大学图书馆供稿)

加了继续编这套课本。他们编的初小课本有所创新，质量好，压倒了其他课本，商务印书馆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当时商务还编辑出版《外交报》，1904年又创刊《东方杂志》。他们出书十分讲究质量，也愿意花钱购买书刊来提高自己的出书质量。

当时坊间石印书质量不高，他们不惜重金购买较好的版刻。商务印书馆还翻译介绍些外国的新思想新学说，于是购买较多的外文书才能从中选择适当的作品翻译。所以西文书也相当多。1907年商务印书馆在上海闸北宝山路建造的总厂落成。这些图书搬进三楼，就成为一个图书馆。1909年，起名叫“涵芬楼”。

涵芬楼收藏以古籍善本称著，其中精品不少。精品多，是由于集中收购了几个藏书家流散的藏书。先由蔡元培先生帮助，买到绍兴徐氏熔经铸史斋藏书。后来又陆续买进苏州蒋氏秦汉十印斋、太仓顾氏读闻斋藏书。民国以后，盛氏意园、丰顺丁氏持静斋、江阴缪荃孙艺风堂等的藏书流散，涵芬楼都买得其中精品数十百种。北方，傅增湘当时在北京。张元济和傅交往极深，他们研讨版本的往返书信极多，张也托傅买书。此外，伍昭宸、胡适都代为介绍购买过一些善本、珍本。

涵芬楼所藏善本，主要在1906—1924年9月间购进。当时各帝国主义除了政治、经济、领土的侵略外，还掠夺我国的珍贵文物。腐朽的清朝政府和北洋军阀对各界爱国人士吁请政府保护文物的呼声不闻不问。许多有识之士只能破产竞买，以阻止珍贵书籍文物落入掠夺者手里。商务印书馆为涵芬楼花那么多钱购买善本书，编辑工作的参考固然是一个方面，但不是主要方面，商务印书馆也曾经影印过一部分涵芬楼的书，但收购这些书的时候并没有准备影印。张元济曾同傅增湘说过，也同顾廷龙先生说过，二十年代才具备大规模印行古籍的条件，在此前不能为，在

此后不可为。当时买书相当大一个原因是为阻止帝国主义文化掠夺尽一分力。1906—1907年议购涵宋楼藏书的这件事是很能说明这个问题的。

清代藏书家陆心源，曾办理过福建盐政，搜括不少钱。乘兵荒马乱，收购故家藏书。他共有一百多部宋元版书，保藏这些书的地方叫“皕宋楼”。陆心源故世后，他儿子陆树藩不能守业，要卖书。日本人闻讯后，仅岛田翰就多次到皕宋楼翻看。岛田看过以后，决心使这批书流入日本。但因为索价太高，开始没有成交。商务印书馆经理夏粹芳知道这个消息后，愿筹集八万银元买这批书。当年商务印书馆实际资本只有四十万零三千五百元，周转率极高，按当年实际计算，一元钱资本当年可获利七角三分八厘。花这么大一笔钱买一批书放着，从经营上讲是没有理由的。张元济亲自去找陆树藩商量，陆坚持要十万元，没有能成交。张先生答应马上设法再筹款，并特别提出不要卖给日本。等商务筹齐款项，陆已经以十万元的价格把书卖给日本财阀岩崎的静嘉堂文库了。1907年夏，皕宋楼的这批书运到日本时，日本汉学家惊喜莫名。岛田甚至说这是日本一大“胜利”，是对杨守敬在明治维新初期利用汉籍跌价的时机，到日本购回一批珍本书这件事的报复商务。以上材料表明张元济等人当时虽然没有能阻挡住这批书的流散，但这件事足以说明他们当时求善本的着眼点之所在。

涵芬楼藏书日益增多，原总厂三楼已容纳不下。1924年5月，专门为它建造的二千六百平方米的五层大楼建成。地点在商务印书馆总厂对面（其中有一小部分是职工俱乐部。1927年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总指挥部就在这儿）。涵芬楼的藏书全部迁入。“涵芬楼”是个“雅号”，商务印书馆的人，包括给它命名的张元济本人，平常都称它为“图书馆”。所以这座楼正面用水泥做的三个大字是“图书馆”，而不是“涵芬楼”，

也不是后来的“东方图书馆”。

1926年商务印书馆成立三十年。作为纪念活动之一,董事会议决将涵芬楼,除善本书外,全部改为独立于编译所的东方图书馆,对外开放,为社会服务。而善本书仍属涵芬楼,由东方图书馆另辟专库代为保管。

商务印书馆将图书馆对外开放的实质,一方面是为社会作贡献,一方面也是扩大自己的影响,取得社会声誉,增加与同业竞争的力量。

涵芬楼藏书整理只有流水簿,用流水号。用“天地元黄、宇宙洪荒”八字,分录古籍、中文新书、日文书、西文书、报刊、地图图片、照片明信片、碑帖。孙毓修曾主持过涵芬楼。他出身南菁书院,曾从缪荃孙学目录版本。对版本、目录有所研究。在辛亥革命前后,他主持涵芬楼藏书的书本目录的编印工作。初刊天字号目录印于1911年。初刊地字号目录约在1915年初印成。这本初刊地字号目录已成为了解我国早期铅印出版物的重要材料。比如这本目录著录了严复翻译的《西人论耶教案善后策》一书。这本书在严复的年谱、传记、翻译书目上都没有提到过。从严复的往来书信中了解这本书可能是据英人密克在香港的一次演讲稿翻译的。密克极力反对传教士在我国横行霸道。

孙毓修后来到编译部工作,涵芬楼由朱仲钧负责。后来,文华学生黄某来,负责西文书,西文书才开始按现代图书馆方法整理。

涵芬楼的,也是东方图书馆的藏书有三个特点。一是中小学教科书是全国收藏最齐全的地方。这和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小学教科书的业务特点是一致的。

一个是地方志。地方志收集始于1915年以后。在此之前只藏有五十多种,1915年《辞源》出版之后,着手编辑各专科辞典。其中《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和《中国人名大辞典》要从方志上查找材料。当时不仅就地在上海收购,各地商务印书馆分支馆也协助收购

和借钞。那时涵芬楼常年有两个人专门抄录借来的罕传方志,到1931年已收有方志2641种,这在当时国内外是无与匹敌的。据知当年国内收罗方志的单位还有日本外务省在北平设立的东方文化总委员会的东方文化图书馆。这个图书馆购书经费达五十万元,着重收集有关我国地理、物产和军事书籍,方志是他们收罗和作提要的重点,但直到1940年左右,十多年才只收罗到一千七百多种。

第三是善本。到1931年底,已经鉴定和整理的共达3,745部35,083册,加上当时尚未鉴别整理的1924年9月购自扬州何家的四万册藏书中的善本,当近五万册。其中海内孤本和精品五百多种五千余册。这个数目就一个私立图书馆来说是可观的。二十年代商务印书馆利用这些善本,配以国内其他公私收藏作为母本,再加从日本拍摄回来国内已经失传图书的照片,陆续影印了《续古逸丛书》、《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等。这些书在保存和流传古籍,方便研究人员利用上发挥的作用是人所共知的。

东方图书馆成立后,馆长是王云五,实际馆务由副馆长江伯训代行。江是福建“才子”,辛亥革命时曾被推举为福建省民政长。

东方图书馆保存了涵芬楼的绝大部分藏书,以后每年用于购书的经费约有二、三万元,截至1932年1月,全部藏书共达四十六万三千余册。这些书按王云五改编杜威分类法的“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整理。中文书(包括线装书)和西文书一条龙混合按分类排架。线装书按卷册装上硬面,使能和精装书一齐并立。

1928年四角号码检字法问世。东方图书馆在暑期举办图书馆学讲习所,招聘高中以上学生一百四十人,讲授四角号码检字法、图书分类法和图书馆业务两星期,然后整理中文图书作为实习两星期。每人给以若干津贴。一个假期就把原来按流水号处理的图书改为按现代方法整理,制有分类、书名、著

者、丛书四种目录。

1926年公开开放的东方图书馆设有普通阅览室、报刊阅览室。1929年又在楼旁建造平房一排,开设儿童图书室。1931年设研究室,并开展外借。据统计,1929年有近三万人次阅览,1930年为三万六千人次阅览。读者主要是附近的学生,店员,工人。目录室设有专人,辅导目录的使用。

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犯上海闸北,29日日军用飞机投掷六枚燃烧弹于商务印书馆总厂。2月1日,东方图书馆又被日本浪人纵火。藏书除宋元精本五百七十四种五千多册,因感于当时局势紧张早已移藏金城银行保险库而得幸免外,其余尽成灰烬。

1932年八月商务印书馆复业后,1933年3月又组织东方图书馆复兴委员会,由胡适、蔡元培等组成。计划募集图书基金,但除了德国学术团体捐赠两千册、法国公益组织捐赠一千六百册书籍外,没有其他收获。后由商务印书馆董事会决定,从每年公益金项提取三分之一作为拨款,每年约有四万多元。另外张元济先生个人捐赠一万元。东方图书馆以这笔钱买书。几年后,到“八·一三”为止,又有近四十万册收藏。因为没有馆舍,这些书只能存放在静安别墅租赁的四幢房子里,不能对外开放。

“八·一三”战事后,商务印书馆无法召开股东大会,提不出公益金,东方图书馆断绝了经济来源,恢复工作陷于停顿。

1944年夏天,规模极小的东方图书馆重庆分馆开放。分馆收藏和借阅的图书都是当时重庆出版的图书,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如《论联合政府》等也收藏。据王云五讲,每天约有二、三百人次前往阅览。比1930年上海东方的阅览人数超过许多。

张元济先生不仅是出版家,也是位藏书家。“一·二八”一役,三十年为商务印书馆精心搜集的图书毁于一旦,他们的心情是可以想见的。所幸五百多部精品早经移出,得以留存。张先生怕再有散失,对这些书陆续进行著录,经过多年,著录完成。解放后,张先生请顾廷龙先生帮助整理付印,即《涵芬楼烬余书录》。全国解放后,经张先生提议,商务印书馆董事会通过,将这五百多部精品,除《永乐大典》数册献给政府外,其余均由中央文化部收购,现藏北京图书馆。从此这批图书获得安全的保管和充分的利用,实现了张先生不使珍贵古籍流散、湮没的夙愿。

至于1933年重新收集的四十万册图书,商务印书馆考虑到东方图书馆实际已经停办多年,根据1933年议决的东方图书馆捐助书籍保管原则第八条,东方图书馆因故停办时,捐助书籍应改捐于中国境内之其他公立图书馆的规定,在1954年交给政府统一调配给各公共图书馆流通使用。这样,这批沉睡多年的图书目前也正在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着。

故宫博物院院刊

《故宫博物院院刊》是故宫博物院院刊编委会编辑的学术性、知识性、史料性季刊。主要发表有关故宫收藏的历代文物、书画和其他艺术品、明清宫廷历史、掌故典章制度、明清档案、古代建筑、博物馆工作经

验,文物保管鉴定技术等方面的学术性论著及知识性文章、资料。内容丰富,图文并茂。

《故宫博物院院刊》由文物出版社出版,每年出版四期,每期一百〇六页,其中十二页为铜版图版。每期定价0.95元。1979年初复刊后,已出版八期。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国外版由中国国际书店发行。